

辽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南齐书 梁书 陈书 魏书 北齐书 周书 隋书 南史 北史 旧唐书 新唐书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宋史 辽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文白对照 二十四史

精华

清史稿（二）

主编 廖盖隆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东乡血案

清朝末年，四川东乡县的地丁钱粮和苛捐杂税极其繁重，包揽征收事务的“支应局”的土豪劣绅，又从中舞弊，中饱私私，肆意盘剥乡民。乡民忍无可忍，以袁廷蛟为首，自发起来要求局绅清算钱粮款项。光绪元年五月，袁廷蛟率领乡民二三千人，高举书写“粮清民安”的旗帜，进驻城南隔河的观音崖，要求减粮税、算粮帐。绥定知府易荫芝亲自来县安抚，答应了一些请求，矛盾有所缓解，可乡民和官府、团勇的冲突还是连续发生。

光绪二年初，东乡知县孙定扬，以袁廷蛟抗拒官兵，抢夺军械，聚众围城为由，禀报府里，请转呈总督派兵清剿。当时的四川总督吴棠，以及稍后的署理四川总督文格，都主张以武力“戡乱”。在文格的指令下，提督李有恒奉命率军数千人前往“剿办”。

李有恒到东乡后，肆意残杀百姓，仅攻打尖锋寨，就惨杀三百余人，翁媪妇孺，一概不免。其他各地，奸淫烧杀，惨不忍睹，甚至旁及周围各县。可他们四处搜索的袁廷蛟，却历尽艰辛，逃出虎口，奇迹般地到了北京，吁请川籍京官，帮他“叩阍鸣冤”。当时的川籍京官已经从亲友来信和四川来京应试举子的诉说中，大致清楚了事件真相，多数人感到极其愤慨。监

察御史吴镇，老家达县紧邻东乡，他一面会同北京官员先将袁廷蛟收监，一面联络四川同乡京官四十多人，联名参奏李有恒等杀戮百姓的种种暴行，并将李有恒的“剿办”告示一并附呈皇帝。

与此同时，川督文格的奏折也呈到了皇帝面前，极力诽谤乡民，并为李有恒辩解。朝廷非常重视这桩大血案，命山东巡抚丁宝桢与文格对调，前往署理川督，查办此事。丁宝桢是清末的一个比较敢作敢为的能员，以诛杀慈禧太后宠幸的太监安德海著名于时。但他查处东乡血案时，却不能排除文格等人的影响，依然以虚为实，坐袁廷蛟等乡民聚众围城，抗拒官兵，掳掠村镇之罪。对李有恒的疯狂滥杀，则轻描淡写，有意包庇。

丁宝桢的奏疏公开后，满朝文武议论纷纷，多数人对他深感失望。光绪皇帝又起用四川籍的前两江总督李宗羲前往查核。李宗羲家住开县，与东乡邻近，许多情况早已了然于胸。他奉诏后，先派子侄易装先行，私查暗访。接着自己亲自深入东乡，查核实情。最后写了奏疏，对地方土豪劣绅的盘剥百姓、官兵的滥杀滥烧、文格与丁宝桢对李有恒的“轻纵”等，作了详细陈述。

可是，平反这一冤案还有不少障碍。朝廷尽管派了礼部尚书恩承、都察院左都御史童华前往四川按治，但这两人柔懦贪鄙，据说接受了文格、丁宝桢数万两银子的贿赂，自然不能



彻底查处。

光绪五年五月，前四川学政张之洞专折上奏，才较为彻底揭露了东乡血案的真相。他以为，血案的酿成，是由于滥杀，滥杀由于诬叛请剿，诬叛请剿由于聚众闹粮，聚众闹粮由于违例苛敛。他说：“东乡知县孙定扬横征暴敛，老百姓没有叛乱，他诬蔑为叛乱。乡民没有围城，他捏造成围城。官兵到了，他不利用这一机会安抚劝退百姓。李有恒要清剿，他不说一句阻止的话，致使流毒半年，杀人如草。倘若不是这个知县捏造事实禀报在前，则总督剿洗的批示就无从而下。倘若没有这个县令煽风点火于后，则各营官兵杀戮无辜的事也就无从发生。”他明确提出了平反东乡冤狱，严惩罪魁祸首的建议。

五个月以后，刑部最后审理，终于昭雪了东乡冤案，宣布袁廷蛟“并非叛逆，众寨民自非叛党”。知县孙定扬、提督李有恒斩监候，秋后处决。其他几个武官、团首，或发往新疆、黑龙江充当苦差，或极边充军。

广大乡民尽管平了反，但带领他们与官府豪绅抗争的义士袁廷蛟，仍然没有逃脱清朝政府的残害。尽管朝廷承认他“并非叛逆”，但没有说释放他。他被押回成都后，仍然关在监中。总督丁宝楨怕他将来赦出后再找麻烦，便在监狱中将袁廷蛟父子二人毙命，达到了杀人灭口、挖根断苗的毒狠目的。

叶新纠冤

乾隆年间，江西南丰县知县风风火火地向他的上司、建昌知府叶新报告说，县民饶令德聚众谋反。叶新吓了一跳，急忙派人进一步查询情况。

原来，饶令德喜好武术，经常在家里同一些热衷于此道的朋友切磋技艺。县令听到一些加油加醋的风言风语，便派吏员前往侦察。调查人员不清楚当地情况，走到了饶令德的仇家。不用说他们得到的情报自然是证实饶家确是谋反的窝子。县令十分满意，马上派兵前往逮捕饶令德。但恰逢饶令德外出未归，兵丁们便将他的兄弟逮到县里关起。饶令德回家后，立刻就到县里投了案。知县对他进行重刑拷问，他受刑不过，不得不招认谋反，而且被迫胡乱点出一些亲戚、朋友、邻里、故旧为同党。县里则据此进行大肆逮捕，甚至牵连到了旁郡。

知府叶新看了呈文，又派人查询了情况之后，认为这个案子十分严重，他很不放心，便将全案囚犯以及有关人证调集府里，亲自进行审问。这时，全案已经株连了七十多人；审问原告、人证和囚犯，则各说不一，悬殊太远。叶知府心里产生了巨大的疑团。

叶新把南丰县的衙役叫来，让他们详细述说逮捕饶令德



弟弟时的情况。衙役说,当初抄检饶家的时候,查获了一个小箱子,怀疑是里面装有金珠宝物,打开一看,是废物一堆,查抄人大失所望,气得顺手就给扔到了野地里。回县后,报告给知县,顺便提起了箱子的事,不料却引起了知县的特殊关注。他断定这箱子里装的是谋反的凭据。知县便把搜检箱子的衙役叫来审问,而且用了刑,那衙役就妄称開箱子时发现一些文书信札,主人吓得拿出银钱送上,衙役接受贿赂后,这才将文件和箱子一起毁掉。知县相信了衙役编的这个供词,然后又用刑讯逼迫饶令德招认了箱子里装的正是造反凭证。叶新弄清这一情况后,已大体上断定这是一桩少有的大冤案。

不久,省里也由于这是一桩牵扯面大的重案,不敢等闲视之,要调集全案人员到省城短审。临行前,叶新将关押的七十多人叫来,打开他们身上的镣铐,命他们随同前往省城南昌。叶知府警告他们说:“打开了你们的镣铐,你们跟着前往南昌候审,有一个逃掉的,我就得替你们死!”到了南昌一查,七十多个人一个也不少,全都提前赶到了。

晋见巡抚的时候,叶新将这桩案子的前后情况详细作了汇报,并明确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这是一桩冤案,应予平反昭雪。巡抚见知府的看法与县里的呈文截然不同,感到十分惊异,而且很不相信。巡抚马上调派全省推勘折狱能员若干人进行会审,结果还是未曾审出饶令德谋反的确凿证据。

不过，巡抚在接到县里呈报时，早已将此案仓促上奏，朝廷已经命两江总督委派官员前来重审。叶知府又有理有据地对此案一一剖解，最后问官们终于取得一致意见，判定这是一桩冤案，保全了二百多人的活命。

《清史稿·叶新传》

军 事

平定噶尔丹之役

清初，额鲁特蒙古分为四部：绰罗斯、都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部落首领称“台吉”。绰罗斯台吉僧格死后，其子索诺木阿拉布坦即位，僧格之弟噶尔丹杀死索诺木阿拉布坦，自称准噶尔汗，并统一了额鲁特蒙古四部。

噶尔丹东征西杀，实力大增，占领了新疆、青海等地，并进而侵犯喀尔喀蒙古，雄心勃勃，竟欲与清帝康熙争夺对中原的控制权。

康熙二十八年(1689)，噶尔丹联络俄罗斯，想与之联合南下，进攻清朝。俄罗斯刚刚在雅克萨之战中被清军击退，与清





朝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惧于清朝的强盛，不愿与清再开战端，因将噶尔丹之谋密告清政府，康熙帝大怒，遂于第二年七月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率军征讨。在乌兰布通，双方经过一场激战，噶尔丹率部败逃。

经此役后，噶尔丹不仅不稍加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召集流亡，扩充实力，继续与清政府为敌。

康熙三十三年(1694)，噶尔丹率兵三万南下，扬言将联合俄罗斯进攻中国。康熙帝忍无可忍，下诏亲征。

康熙三十五年(1696)春，康熙帝亲统大军北上，命将军萨布素率一部从东面进发，将军费扬古率一部从西路进发，他自己率大军为中路，夹击噶尔丹。

噶尔丹闻知康熙帝御驾亲征，不敢迎击康熙帝的中路军，欲先进击费扬古的西路军，然后再与中、东两路清军作战，各个击破。

费扬古的西路军经过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抵达昭莫多时，将士们已精疲力尽，马僵其半，难以迎敌作战。“费扬古以马力不能弛击，非反客为主，以逸待劳，不足以与敌争胜，于是乃在距昭莫多之西三十里之多小山树林之处止营，依山据河以列阵，于林木茂荟处设伏兵，然后遣前锋四百骑至昭莫多之东，与敌接触，且战且退，以诱敌来至阵前。”

噶尔丹发现费扬古的四百前锋骑兵后，不知是计，便派其妃阿奴硕哲率先锋军万骑追击之，噶尔丹率军在后策应。



阿奴硕哲虽系女子，却骁勇善战，武艺高强，统领先锋军，每每冲锋在前，身先士卒，屡战屡胜，噶尔丹的部下称之为“阿奴娘子”。

阿奴硕哲的先锋军进入清军伏击圈后，费扬古一声令下，顿时千铳并射，万弩齐发，噶尔丹军死伤无数，人马相枕，血流成河，以至人马的尸体挡住了清军的视线。费扬古令清军以盾牌作掩护向敌人靠近，缩小包围圈，继续向敌人射击。阿奴硕哲果然顽强善战，在部众死伤过半的情况下，犹率残部拼死冲杀，战事非常酷烈。

费扬古居高观战，见敌人的后背，又有一支人马赶来，却没有参加鏖战，而是在一旁徘徊观望。费扬古断定此乃噶尔丹部的妇女辎重队伍，于是抽调一支人马绕到其后，进行突击。

噶尔丹的那支人马果然是其部的妇女、驼马及辎重队，毫无作战能力，清军一攻，便纷然大乱，四处奔逃。费扬古乘机麾军全面进击，阿奴硕哲中铳矢而亡，余众遂溃。

清军乘胜连夜追击三十里，将噶尔丹的先锋军消灭殆尽，共计斩首三千余级，活捉数百，俘虏两千余人，缴获驼马、牛羊、庐帐、器械无数。

噶尔丹此时正率军向昭莫多进发，至昭莫多之东，方知他的阿奴娘子已呜呼哀哉，不禁气夺胆丧，不敢继续西进与清军决战，凄凄惶惶，向北逃窜。其部众知大势已去，也纷纷叛逃，



噶尔丹仅率数十骑逃走。

再说康熙帝的中路军在沙漠中行军逾月，备尝艰苦，康熙帝亲自寻找水草，与士卒同甘共苦，锐意进击。大学士伊桑阿唯恐康熙吃不了苦，劝其回京，康熙帝执意不肯，怒道：“朕祭告天地宗庙出征，不见贼而返，何以对天下？且大军退，则贼尽锐往攻西路，西路军不其殆乎？”

康熙帝所料一点不错，噶尔丹果然先进攻清西路军，幸有抚远大将军费扬古指挥有方，出奇制胜，清西路军才化险为夷。

康熙帝率军疾行支援费扬古，赶到昭莫多时，战役已经结束，康熙帝乃令费扬古驻军昭莫多，扫清噶尔丹的残余势力，然后在察罕拖诺山勒石纪功而还。

噶尔丹势穷力孤，欲降清朝，乃遣使窥探康熙帝的态度。使者临行，噶尔丹叹道：“天下人果不相同！中国皇帝，神灵奇异，闻其行军所至，泉涌于沙，草生于磧，泳泮于河，是天助彼也；今我所属之人已皆往属，是人助彼也。尔往其所，观其侍从大臣行止若何，归日议之。”

康熙帝宽大为怀，决定赦免噶尔丹之死罪，令其来京谢罪。噶尔丹疑惧不敢晋京，康熙帝等到年底，噶尔丹仍不至。康熙帝乃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初再次亲征，噶尔丹畏罪自杀，于是北边大定，阿尔泰山东西一带辽阔疆土皆入中国版图。

平定噶尔丹之役，便是康熙武功的一例。

(《清史稿·费扬古传》、

《清史稿·圣祖纪》)

抚顺之战

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后金皇帝努尔哈赤声称有七件恨明之事，计划率众侵掠明朝边境。

所谓“七大恨”，不过是努尔哈赤兴师攻明的借口而已。他担心师出无名，故以此煽动兵民。他还对诸贝勒说：“我与明之怨仇，共有七大恨事，其余小忿，不可尽言。”

当时明为大国，后金反为明的一个藩国，要与明朝为敌，是要冒极大风险的。而努尔哈赤雄心勃勃，锐意对明作战，一试兵锋。为了进一步激励将士们的斗志，他扬言西南方有黄气贯月中，并对将佐们说：“天意如此，汝等勿疑，吾计决矣，今岁必证明！”

是年四月，努尔哈赤先派一支部队共五千人佯攻明之清河，届时绕过清河，进攻抚顺南部的马根丹。他则亲率主力一万五千余人，沿苏子河进攻抚顺。此乃分进合击之战术，从清河进攻马根丹的部队，旨在牵制守卫抚顺的明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由于后金一直是明朝之藩属，故明廷从未料到，后金会来进攻抚顺。守卫抚顺的明军亦麻痹大意，遂予敌以可乘之机。

努尔哈赤既知明军无备，乃从先锋军中挑选出五十人，命他们扮成商贾模样，组成商队，只等四月十五日抚顺马市时前去赶集。

努尔哈赤又设法弄到了明廷发放的过关敕书共五十道，分给扮成商人的士兵每人一道。四月十三日，这支负有特殊使命的“商队”便来到抚顺城下，手持过关敕书，谦辞厚礼，要求进城参与马市交易。

明抚顺守备王命印令游击将军李永芳守卫城门，负责检验过关敕书和管理马市。李永芳看到这些商人皆带着许多货物，并持有过关敕书，并不起疑，遂放之进城。

“商队”甫进城，突然发难，击杀明守城之兵，斩关夺旗，大开城门。后金大军早已倍道潜进，神不如鬼不觉地抵达城外。及见城门大开，知是“商人们”已经得手，于是蜂拥入城。

王命印闻讯大惊，急忙率兵来战，结果战死。李永芳见大势已去，干脆投降后金。

努尔哈赤占领抚顺后，纵兵抢掠，将城中数千户商民之财产尽数掠夺，运回建州，然后令士兵毁抚顺城。

由此可见，此时，努尔哈赤尚无远图，不过为了抢掠明朝边民的一点财物而已。

此役是后金建国以来对明的第一战，努尔哈赤采取奇袭



手段，以最小的代价，赢得了抚顺一城的财物。后金军退后，明总兵张承荫等率军来援，见后金已退兵，遂跟踪追击，努尔哈赤率军迎战，大破明军。自此，努尔哈赤发觉，所谓“大明”天朝不过如此，遂生继续南下攻城略地之念。

(《清史稿·太祖纪》、

《明史·神宗纪》)

左宗棠收复北疆

清光绪二年(1876)前，在新疆西部，有一个浩罕国。同治四年(1865)，浩罕国一个叫做阿古柏的军官趁新疆发生内乱之机率浩罕兵入侵新疆，占领了南疆诸城，并进一步向北疆进犯。

俄罗斯国早就对新疆垂涎三尺，见阿古柏在新疆得手，便派人与阿古柏联络，俄罗斯承认阿古柏是“独立国君主”，阿古柏则同意给予俄罗斯在新疆的某些特权。

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也相中了新疆这块宝地，不愿新疆落入俄国之手，便也派人到新疆与阿古柏联系，向阿古柏提供武器，还为阿古柏提供军事工程专家及军事教官，协助阿古柏发展军事势力。

对于阿古柏来说，“有奶便是娘。”他见英国给予自己的好



处大于俄国的小恩小惠，便与英国订立条约，同意英国在新疆设领事馆，并给予英国一些俄国也享受不到的特权。

西北的局势日趋恶化，清政府感到，新疆问题若不解决，不仅新疆将落入英俄之手，连陕、甘以及蒙古亦将难保。

主张收复新疆最主要的人物，是赫赫有名的左宗棠左大帅。左宗棠少年时博览群书，却屡试不第，直到四十岁，仍是一个乡曲举人，在湖南老家以教书谋生。太平天国事发后，太平军进攻长沙，湖南巡抚骆秉章闻其名，于危难之际请他入幕府参谋军务，从此，左宗棠在对太平天国作战中，方脱颖而出，与曾国藩并称“中兴名臣”。后来，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成功地平定了陕甘回民之乱。他有感于西北的艰危时局，不顾自己已经是六十余岁的老人，极力主张收复新疆，并毅然承担起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重任。

光绪二年(1876)，左宗棠经过充分准备，率大军向西北挺进，首先收复了乌鲁木齐，并逐渐收复了北疆各城，准备第二年春天，再收复南疆失地。

阿古柏在北疆大败后，连忙调集兵力，驻守达坂城，令部将马人得守卫吐鲁番，阿古柏退到达坂城东南、吐鲁番西南的托克逊。不久，阿古柏再向南退，至喀喇沙尔驻守。

光绪三年(1877)春，左宗棠派大将刘锦棠率四十个营的兵力为“攻击兵团”，从乌鲁木齐南下，进攻达坂城；又命张曜、徐占彪各率一军沿哈密、木垒河西进，进攻吐鲁番，以策应刘



锦棠军。

达坂城是南疆的门户，阿古柏在此置有重兵。为阻挡清军南下，阿古柏命引湖水护卫达坂城，水及泥沙深及马腹。

刘锦棠率军潜进，至达坂城下时，正值夜间，又逢大雾，月色无光，天地间一片昏黑。刘锦棠令士兵悄悄渡水，逼近城下设垒。

达坂城外，尚有一支敌兵驻扎。清军没等敌人弄清是怎么一回事，便干净利索地歼灭之，并开始攻城。

清晨，清军已突入城中，城内敌军在睡梦中惊醒，大为恐慌。这时，城中的火药库被清军的枪弹击中，突然爆炸，敌兵顷刻乱成一团，清军所向披靡，顺利占领了达坂城。

此役中，清军杀敌两千余，俘虏一千二百名，缴获战马八百匹、枪炮器械千余件。阿古柏的干将爱伊德尔呼里及其营官六人、哨官九十八人被捉。

阿古柏的部下，多是新疆的回民。刘锦棠遵照左宗棠“不分汉回，只问良莠”的指示，将投降的回兵一律释放，并发放衣服、干粮及盘缠。

刘锦棠此举，深得回民之心，因此清军所到之处，回民纷纷迎降，南疆诸地陆续被清军收复。

阿古柏此时众叛亲离，于四月中旬在库尔勒自杀。其次子海古拉带着他的尸体西逃，至库车，阿古柏的长子伯克胡里杀死海古拉，再西逃于喀什噶尔即位，继续与清廷为敌。左宗



棠上疏清廷，得到慈禧太后批准，欲待秋日，进兵南疆，于是又有左宗棠收复南疆之战。

(《清史稿·刘锦棠传》、
《清史稿·左宗棠传》)

冯子材收复谅山

公元 1883 年，法国派遣军队进入越南，与越南政府签订《顺化条约》，强迫越南成为其“保护国”。同年十二月，法军向驻扎在越南的清朝军队发动突然袭击，中法战争爆发。

第二年七月，法国海军又突然袭击马尾港的清军水师，仅用了一个多小时便击沉了清军水师的全部战舰，并击毁了马尾造船厂，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

这次战争分别在三个地区进行：越南、台湾、澎湖。1884 年十二月，在越南的法军大举进犯中国的广西边境，两广总督张之洞深感人才匮乏，特向朝廷推荐已经退休的原广西提督冯子材领兵赴越南作战。

冯子材字翠亭，曾跟随向荣、张国梁与太平军作战，以英勇顽强闻名，一次，他率所部一天之内攻克太平军营垒七十余个，张国梁拊其背赞叹道：“子勇，余愧弗如。”因功升为副将，官至广西提督。中法战争爆发后，已是七十高龄的冯子材毅



然接受清廷的征召，以“帮办广西军务”的头衔与其两个儿子率领一支军队赴越南。

冯子材尚未到达越南，法军已大举进攻谅山，驻守谅山的清军不战自溃，法军兵不血刃，进入谅山城，并立即向北追击溃逃的清军。

法军追至镇南关（后改名友谊关），与清军展开激战，清军提督杨玉科阵亡，清军遂败，法军因纵火烧毁镇南关。

这时，冯子材率军赶赴此地，见法军烧毁镇南关后已经撤走，便在关内筑长墙达三里许，外挖深沟，以防备法军从镇南关进入中国边境。

法军从镇南关撤走，驻扎在关南三十里处的文渊州，计划稍事休整后进攻广西。

1885年二月，冯子材得知法军将于三月二十四、二十五两天进攻广西，于是决定先发制人，出兵袭击文渊州。

清将潘鼎新等大惧，劝冯子材谨慎从事，冯子材力排众议，亲自率奇兵出关，于二月初四夜袭驻扎在文渊的法军营，出敌不意，斩获甚多。天亮时，冯子材率军安然凯旋。

遭此袭击，法军伤亡颇众，士气大沮。清军则欢欣鼓舞，士气高涨。法将尼格里恼羞成怒，乃率法军分三路进攻镇南关，以图报复。冯子材派王孝祺率一部绕到法军之后，又派苏元春攻法军左翼，冯子材亲率大军迎击来犯之敌。

法军在开花炮弹的掩护下向清军阵地猛攻，炮弹已将清